责任编辑：戴菁　E-mail:daijing314@163.com　电话：010-62805132　　2014年9月15日

“新常态”与“新政”

——访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

韩庆祥，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央组织部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

学术研究方向主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人学、政治哲学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路。人学研究及提出的能力本位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马克思哲学三形态理论、三种机制理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路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2004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8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4年入选“国家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本报记者　戴　菁



记者：韩老师，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想是从近阶段开始的，且颇受关注。请问这与您之前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内在逻辑是怎样的？

韩庆祥：研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是我学术研究历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在研究社会结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其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根本方略是全面深化公平正义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全面深化公平正义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核心，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调整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这在本质上就是结构问题。况且，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本质上就是对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存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反映。于是，我由研究社会结构问题，合乎我的学术逻辑，从学术上去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文本，我初步意识到是否可以用一个具有展望性的概念对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加以提炼和概括——“习近平新政”。我这里讲“新政”，不主张过于刻意拔高，而主张从哲学上实事求是地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这可能是当下最热的经济关键词了，怎么理解您从哲学上所总结的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呢？

韩庆祥：这里的“新常态”，超越了今天人们所侧重的经济领域。我从学理上所理解的“新常态”的“新”，就是具有展望性的“新政”，而“常态”，就是基于现代新理念新规则而正在建立起来的常久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尽管这种新常态还未完全成为一种形态，但可以从哲学上前瞻性地探索其雏形。

记者：那么您所理解的习近平“新政”，主要体现在哪里？

韩庆祥：在阐释习近平“新政”之前，先做几点说明：一是本论题是一种“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我是研究哲学的，哲学就是“高卢的雄鸡”，它应对事物和对象进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二是本文只是“初步”研究的学术成果，还谈不上属于完整系统且具有内在逻辑的研究；三是我所讲的“新政”，不主张“刻意拔高”，而主张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本为依据，从哲学上实事求是地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四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各种严峻的矛盾、风险、困难和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产生了新气象、新变化、新效果，再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

习近平“新政”，首先新在“坚定刻骨铭心的自信”。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纵向看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还是横向看国际比较，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及其被凌辱、欺侮和挨打，我们中国人相对缺乏国家自信和民族自信。比如，在经济上，我们还没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和成就而提出自己原创的、为世界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在政治上，一些人对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十分崇拜，而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不屑一顾。如此等等。正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柯伟林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已经强大，但仍然不够自信。缺乏自信，就会动摇我们的理想信念，丧失我们的话语权。

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三番五次强调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积极唱响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提升中国话语权，甚至强调要坚定刻骨铭心的自信。这种鲜明的自信是治国理政的认知和心理基础，它不仅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而且更重要更鲜明地体现在他治国理政的行动上，体现在其所从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军事和外交等所有活动领域。

记者：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我们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及难题？

韩庆祥：这也是习近平“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并全面开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这可谓“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政府主导”。在现代化起飞阶段，首要任务都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追赶发达国家。尤其对具有“时空压缩”背景与特征的中国来讲，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追赶”的任务更为迫切。基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我们党把首要根本任务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即“定标”—“做大蛋糕”。要“做大蛋糕”，需进一步“定法”：既需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又内在需要政府主导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之最大优势，就是决策正确，政府可以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由此，“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政府主导体制”（政府的力量），就被突出出来。

“蛋糕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对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为“发展起来以后”阶段，学界将其归结为“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阶段。相对“发展起来”即“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了表达诉求期。今天，民众在表达各种诉求，如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和参与诉求等。民众表达诉求需要合理满足。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难题？仅仅依靠以政府力量为核心的“政府主导体制”已显得远远不够。而且，如果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也易产生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而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好的制度模式。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的一种新的理解。这里讲的治理，首要是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是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即“建构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化制度模式”（政府主导依然蕴含在这一框架中）。而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制度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治走向“法”治；由“统”治走向“共”治（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共同治理）；由“权”治走向也注重“能”治；由“他”治走向也注重“自”治。这种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制度模式，既有利于破除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约的体制机制弊端，也有利于破解由“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和公正缺失的权力运作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显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试图运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三种力量”来治国理政，并为解决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矛盾、难题和问题提供一整套制度设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记者：领导干部从政一般有两种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二是直面并破解发展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的“潜绩”。一些领导干部多走第一种思路，不愿意走第二种思路。在您看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路新在哪里？

韩庆祥：这涉及习近平“新政”的另一个内容：“问题导向且用强权与治权统一破解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的新思路”。习近平总书记也走第一种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种思路，敢于直面并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难题和问题，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敢于担当”精神。“左”和“右”是鲜明的意识形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对“左”“右”的无谓之争及其危害具有深刻体验和认知。他作为我们党的总书记，期望把大家的聪明才智和创新活力引导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来。所以，他明确强调“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其中蕴含的智慧，就是把人们对“左”和“右”的关注及其争论引导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来，引导到直面并破解发展中的矛盾、难题上来，引导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来，引导到注重实际、注重实干和注重实效上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明确的“问题导向”，其新意就在于超越“左”“右”之争，向注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转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问题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问题”。这种“命运性问题”主要包括“影响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和“四大危险”，甚至包括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阻挠。不破解这些“命运性问题”，就会影响发展稳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影响当代中国命运。如何破解这些“命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倒逼改革”。解决这些“命运性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是要解决“命运性”问题的。由此，他说：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打铁还需自身硬”，可以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标志性符号。其中，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强权与治权统一的执政智慧：要破解“发展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如“体制机制弊端”“利益固化藩篱”，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强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权力），即通过使“自身硬”树立强力强权强硬的中央权威，以有力破解发展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遏制不断泛滥的腐败和不良作风，甚至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同时又必须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的勇气坚定不移地“治权”，向缺乏制约的公共权力开刀，把权力关在制度尤其是法治的笼子里。

记者：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梦等，这些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党提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习近平“新政”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新意？

韩庆祥：这是习近平“新政”的另一个内容：“建构中国话语体系、话语方式和话语权的新自觉”。话语体系与实践发展和话语自觉有关，话语方式与文风有关，话语权与国家综合国力、自信心和话语体系建设有关。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也逐渐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在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方面，由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还缺乏自觉和自信，使得我们在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在话语表述方式上，要么缺乏大众化，过于抽象、难懂、晦涩、繁长，要么缺乏学理支撑，宣传性口号过多，要么缺乏国际化或普世化，在与西方对话、交流时缺乏共同“语言”，难以被真正认同；在话语权上，要么一些人总认为西方月亮比中国圆，要么对我们的实践成果和话语体系优势缺乏自觉的学理阐释和有效国际传播，结果影响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甚至在学术领域，使西方话语在中国大行其道，出现崇拜西方话语的“洋教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力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种新的努力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充满自信。即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充满自信。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崇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坚守社会主义文化，强调要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充满刻骨铭心的自信；二是高度自觉。即能自觉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及其所促进的中国成功的实践成果进行系统的学理阐释和有效传播，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进行系统的学理阐释和有效传播，以建构能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中国话语体系；三是力戒“假大空”和教条式的话语表述方式，力求使语言表述真实、具体、朴实、生动、接地气；四是力求使话语表述大众化、国际化，扩大其影响力，争得国际上的话语权。实际上，在许多他最关心的重大根本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常常使用的是大众化、国际化的语言表述，如“中国梦”，“打铁还需自身硬”，“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钉钉子”，“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腾笼换鸟”，“老虎苍蝇一起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啃硬骨头”，“刮骨疗毒”，“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再如“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等。

记者：以往，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然而，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理论与实践反差较大，面向政治的注解、宣传和活动多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少。习近平总书记在抓落实方面有哪些新的风格和举措？

韩庆祥：习近平“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还包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刚性执行力的新气象”。习近平总书记引用马克思的名言特别强调，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他在强调落实的执行力问题时明确指出：一定要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钉钉子”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或战略定力抓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说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一分部署”，说的是宏伟蓝图与具体决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和总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改革蓝图有了，现在的关键是把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要把“一分部署”“变为现实”，最重要的就是“九分落实”，即付诸实践行动。如果没有“九分落实”，“一分部署”再宏伟、再激动人心，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这种执政风格也体现在“调结构、转方式、保质量”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权威、钢铁般的执行意志，克服重重阻力，实行经济新政：一是坚定从实践上推进和执行“调结构、转方式、保质量”的经济思路，尤其是把以“调结构”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改革”作为新常态，近两年取得了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和成效；二是坚持稳中求进，既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论断，并稳妥推进其进程，也力求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正确解决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三是进行试点，逐步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这种执政风格还体现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

实际上，习近平同志从政以来，一贯强调贯彻落实的执行力问题，这已成为他鲜明的从政风格和工作作风。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抓落实如敲钉子》的短评中明确强调：“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他数次讲话都强调要认真抓落实。

一级教授访谈

坚守为教之道

□韩庆祥



我是1989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到中央党校工作的，迄今已25年。这25年，我既是教师，把教学作为中心，认真从事教学工作；又是一名学者，致力于学术研究，还担任过哲学部副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也能兢业地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我力求把职业当作事业，积累了一些体会。今天讲一讲，也算是对自己25年工作的一种全面系统的检讨和反省吧！

第一个体会，就是坚守政治之道。这就是“党校—党员—党性”。我是中央党校一名教师和学者，应具有“党校意识”；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具有“党员意识”；我作为中央党校且又是党员的教师和学者，须具有“党性意识”。“党校意识”“党员意识”和“党性意识”，是我作为中央党校教师和学者的政治本质，由此应自觉坚守为党而工作、为中央党校而工作的政治理念和信念。这就决定我在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一切活动中，要时时刻刻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认认真真地努力做好中央党校校委安排的各项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做人、做事和做学问。这是我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最重要的一个体会，它是我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个体会，就是坚守事业之道。这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人这一生主要就是事业和生活。事业有事业之道。我理解的事业之道，就是坚守道德情操做人，凭借能力本事做事，科学严谨做学问。所以，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尽力做到锐气行于事，和气行于人，严谨行于做学问。

第三个体会，就是坚守工作之道。这就是“定位—定标—定法”。“定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所谓定位，就是搞清楚“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处在什么方位”。我是中央党校一名教师和学者，我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种定位就决定我应做什么，应确立什么工作目标，即要搞清楚“我应做什么”。这就是“定标”。那样的“定位”，就决定我必须当好教师，讲好课，当好学者，做好学问，当好管理者，善于组织协调沟通并带好团队。目标确定之后，方法就是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定法”。所以，运用什么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实现工作目标就显得十分关键了。我的体会是，在中央党校工作，要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最重要的方法有二：一是要准确找到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结合点，注重“三位一体”的一体化，并一以贯之地执着追求，具有恒心和定力，然后就是扎扎实实抓落实；二是要运用动力、平衡、调整三种机制。用动力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平衡机制处理好各方面各部分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化，用调整机制解决动力和平衡方面出现的问题。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之所以还能取得一些成绩，这种工作之道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体会，就是坚守人生成功之道。这就是“优势—短板—支点”。根据我的经验和体会，人生成功应遵循三句话铁律：发挥比较优势，克服发展短板，打牢发展支点。人这一生很大程度上是靠自身的优势吃饭的，你要成功并辉煌，首先应发挥其比较优势，它影响你“人生长度”；同时也一定要克服自身的短板，因为它会影响你“人生高度”；当然，还要打牢你人生发展的支点，它影响你“人生厚度”。所以，在中央党校工作25年，我与其他教师一样，尽力把自己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优势发挥出来。在教学中，注重问题意识、学理分析和思想力量，注重逻辑思维、提炼概括和精要表达，注重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在科研中，注重“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用思想传递时代，用理念引导发展”的研究风格与治学理念，把学术研究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起来；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坚持用哲学指导工作，把职业当作事业。当然，我也注意克服自己某些知识的短板；我还把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人际和谐、核心竞争力和团队意识作为我人生发展的五大支点。历史和实际表明，这三句话铁律对促进我人生成长大有裨益。

第五个体会，就是坚守做学问之道。这就是“学术坚守—学术方向—学术积累—学术创新”。根据我多年做学问的体会，作为学者，要把本专业的学问搞好，就要坚守以下十个重要环节：一是要基于实践发展要求、学术研究进展、所在单位要求和个人学术素养，合理确定好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并长期聚焦于这一研究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形象和学术符号。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研读“中西马”相关经典和文献，做好学术思想资源积累工作。三是具有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选准选好研究选题。这种选题，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逻辑突出出来的问题，又是中央、学术界、社会以及所在工作单位较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四是选定好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五是注重学术创新，力求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大论断、大命题和思想理论，积极为“干部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政策咨询”，为党和国家决策，为推进社会实践发展与学术发展，为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竭尽心力，拥有思想的力量。六是具有始终如一的研究逻辑，坚持学术研究的连贯性。七是对学术的坚守，即对学术研究具有敬畏之心和宁静之心，远离浮躁。八是坚守学术规范。九是注重参加学术活动，加强学术交流。十是注重调查研究，走向并了解社会，关注并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并反映大众的需求和呼声。只有这样来做学问，其学术研究成果才能产生学术影响、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缺乏对学术的坚守，缺乏明确的研究方向，缺乏学术积累，缺乏学术创新，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缺乏对时代、社会实践和人民大众的关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软肋，应力戒之、克服之。